



## 孙子文化 与 智者智城

# 兵法经营的回顾与展望

姚振文

兵法经营的长远发展必须建立在经营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同时必须将其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为此,回顾多年来兵法经营发展的历史,梳理兵法经营存在的理论成果,揭示兵法经营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未来前景,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一、兵法经营的发展历史

1. 战国时期兵法经营的萌芽。早在战国时期,大商人白圭就明确谈到:“吾治生产,犹执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史记·货殖列传》)。这说明,白圭是主动自觉地运用兵法进行经营的,此可谓兵法经营的萌芽。究其根源,它与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相对发达有关,也与此时期兵法谋略的繁盛和充分运用有关。当然,随着汉朝以后“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兵学经营的萌芽很快夭折,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已很难再见到兵法应用于经营的实例和记载。

2. 二战后日本兵法经营的兴起。《孙子兵法》在现代商战中的应用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当时,许多日本军人退职以后从事经商活动,因而不自觉地将军战中的谋略思想运用到商战之中(二战后的欧洲也大量存在这种情况),这其中也包括《孙子兵法》的思想。比如,大坂武夫战后出任东洋精密工业公司总经理,董事长,他将《孙子兵法》运用于经营实践,很快使企业起死回生。之后,他创办兵法经营塾,从《孙子兵法》中选取适合的内容,联系个人的经营体会进行讲授。1984年,他出版了《用兵法指导经营》一书,详尽地介绍了他授课的情况和课程内容。在他的影响之下,日本企业界掀起孙子兵法应用的热潮并出现了“兵法经营管理学派”。

3. 20世纪80年代中国兵法经营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发展市场经济,企业家迫切需要经营管理理论的指导,而此时我国的管理理论和竞争理论几乎是一片空白。在此情况下,人们把目光转向了孙子兵法。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兵法经营性质的著作,全国性的“孙子热”由此兴起。实事求是地讲,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机会主义”盛行的时代,法律法制不完善,很多人能够通过小聪明、小智谋一夜暴富,而这也使兵法中的诡诈思想和谋略手段大行其道,所以此时人们在商战中运用的主要是孙子的“术”。

4. 20世纪90年代兵法经营发展的新趋向。这一时期,企业界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的经营管理理论,因而兵法经营的发展也主要体现在孙子思想理论与西方经营管理理论相结合。其代表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南开大学教授陈炳富,一个是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周三多与他人合作,出版了《孙子兵法与经营战略》一书。另外,此时的许多军人转业到企业,也把兵法或军事思想带到企业经营管理中,如联想的柳传志、华为的任正非、万科的王石等等。

5. 21世纪初中国兵法经营的理性反思。随着中国入世的过渡期完成,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市场竞争的条件越来越成熟。另一方面,企业规模的扩大,竞争范围的国际化,也都需要高层次的战略指导理论和科学化的企业管理模式,这就要求人们对兵法的学习要从“术”的借鉴转向“道”的感悟,从一时的兴趣和狂热转向长期的自觉地运用,从而出现了兵法经营的理性反思。如李零教授在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一书中,就强烈反对对孙子文化应用中的急学滥用现象,他认为当前的一些人把孙子

文化搞成了关公文化,有求必应,心想事成,拿它当狗皮膏药、万金油,这是一种类似于迷信的自欺欺人的现象。

### 二、兵法经营研究的代表人物及成就

1. 北京大学赵靖分析了兵法与经营的接合面问题。赵靖在《孙子兵法——经营管理教科书》一文中认为,兵战和商战具有相通性,兵法可以用于经营管理,但两者的结合不是简单地比附、对接,而是要找到一个“接合面”,进行改造和移植。为此,必须全面研究《孙子兵法》的基本内容和思想,看它们同现代经营管理有什么相通、相合之处,然后移花接木,培育成新品种,以丰富和发展现代管理科学。

2. 周海炜论传统谋略的知识转换问题。周海炜在《战略管理中的企业谋略及动作机制研究》一文认为,中国传统的谋略是以追求实用功利价值为导向,在管理中呈现复杂多变的形态,具有自己独特的知识存在方式,这与西方的战略管理知识和理论具有很大的差异。为此,他将兵法谋略与西方战略置于不同的管理文化背景下进行分析,探讨其各自的知识特征,进而提出中国传统兵学谋略的现代转型问题,这实际是在为中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提出一种可操作性的思路与途径,同时也为兵法经营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撑。

3. 洪兵构建孙子的战略思想体系框架。许多兵法经营的研究成果,要用西方的管理理论来解读孙子的谋略理论,这势必会肢解孙子的思想体系,进而造成许多问题。有鉴于此,许多学者试图从孙子兵法的兵学范畴出发构建兵法经营的理论框架。如洪兵先生在其《中国战略理解》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由“胜”“力”“利”“道”“形”“势”“柔”“知”“专”“度”“奇”“变”“致”13个范畴组成的中国战略体系框架,这一框架实际上为后来的兵法经营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吴如嵩提出构建兵法经营学的基本思路。吴如嵩认为:在商战中运用孙子兵法,不能搞简单的对号入座,更不应该牵强附会,必须建立起兵法经营学理论体系,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打破原来的经济理论体系,把原来的经济学理论也打破,然后重新糅合、架构,这样有了一个科学的理论指导体系,孙子兵法应用在实践上就不至于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吴如嵩的这一观点是非常有远见的。

5. 宫玉振构建兵法经营学体系。2010年,吴如嵩的学生宫玉振出版《孙子兵法与竞争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他主张,《孙子兵法》制胜理论体系是由“全胜”“知胜”“先胜”“战胜”四个方面构成的,而从企业竞争的角度来说,这四方面同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以动态竞争为特色的企业竞争理论体系。该书揭示了兵法经营的基本原理,出版了《孙子兵法与经营战略》一书。另外,此时的许多军人转业到企业,也把兵法或军事思想带到企业经营管理中,如联想的柳传志、华为的任正非、万科的王石等等。

6. 纪洪波对构建兵法经营学的贡献。在2008年和2009年,为了推动兵法经营学的学科建设,纪洪波敏锐地抓住核心问题,指示《滨州学院学报》推出了两期特刊——《兵法经营学构建研究》和《再论兵法经营学构建》。在2008年的特刊上,纪洪波发表《兵法经营学体系之构想》一文,在阐释兵法经营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兵法经营学理论体系。在2009年的特刊上,又发表《兵法经营学研究范式之构想》一文,该文致力于解决构建兵法经营学理论体系的方法问题。2012年10月,又发表《孙子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及其对企业竞争战略的启示》一文,该文旨在解决兵法经营理论应用于实

践之后的复杂性和实效性等问题。

### 三、兵法经营学发展的未来展望

孙子兵法本身充满了哲学,同时它又是关于“强竞争”的谋略理论,这使其应用于商战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美好前景。然而,实事求是地讲,当前的兵法经营仍处于缓慢的生长发展期,近期内很难出现大的突破或质的飞跃。这是因为,兵法经营实践及理论研究尚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其一,学术成果的低层次重复。目前,有相当比例的所谓专著和论文其实是在简单重复前人的劳动,几年前已经有人做过的题目直到现在还在有人不断地做,而且思路、内容、观点乃至语言都没有多少新意。

其二,研究队伍与研究风气的混乱。洪兵在其《孙子兵法与经理人统帅之道》中指出,“一些不见经传的孙子兵法研究顶尖专家到处授课;一些所谓孙子兵法专家著作错漏百出;一些徒有虚名的所谓孙子兵法应用中心纷纷出笼,招摇撞骗。”

其三,理论与实践结合不足。兵法经营最大的问题,是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目标一直未能实现,兵法经营搞了这么多年,真正成功的兵法经营企业家并不多。

为了推动未来兵法经营的良好发展,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兵法经营要处理好兵法与现代管理理论的关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孙子兵法》不是专门的企业经营管理著作,它是一部兵书,它的许多思想和原则可以指导商业竞争,但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所以,在任何企业的商战实践中,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管理制度是第一位的,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根基,孙子兵法的谋略思想是第二位的,是企业经营管理的辅佐,二者关系不可颠倒。

2. 兵法经营要处理好“仁”与“诈”的关系。《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兵书,它对战争的指导自然要遵循战争本质规律,包含有“兵以诈立”等战争命题,但将其运用于市场竞争中却不能蔑视规则,不讲诚信,更不能肆意跨越道德底线。在笔者看来,我们必须注重兵、儒、道思想在经营管理实践中的融合应用,要将儒家的仁爱民本精神和道家的自然无为精神融入兵法经营管理理论中,以消解兵法谋略用于经营管理后的负面影响。

3. 兵法经营需要有丰富的实践案例作支撑。兵法和管理一样,都是实践的学科,仅仅空谈理论道是行不通的,为此,研究者必须扎根到企业经营实践中,真正研究企业法谋略可以解决企业中的哪些实际问题。只有真正懂得现实战争的人,才能通过中国传统兵学的学习不断提高自己,从而成为出色的将领或军事理论家;同样的,只有熟悉现代经营管理的人,才能从中国传统兵学中汲取营养,并成功地指导自己的经营实践。

4. 兵法经营需要以企业家个人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当今的兵法经营成就,主要表现为企业家个人对兵法经营的一种感悟,或者说是他们结合了自己的实践经验,将兵法经营上升为一种经营管理艺术。这是因为,《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兵书指导企业经营管理并非现成的药方,它需要应用者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做基础,方能立足宏观,高屋建瓴,对《孙子兵法》的指导思想和价值作出深刻感悟,进而在实践中灵活运用。

(作者为滨州学院孙子研究院教授、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

## 规范化建设让基层监督“有形”更“有效”

张传科

监督是纪委监委的首要职责,是纪检监察机关开展工作的重要基础。“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基层是全部工作的基础和关键环节,基层监督也成为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

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改革成效不断彰显,但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尤其是乡镇纪检监察机关,普遍存在监督力量薄弱、履职能力不强、监督质效不高等问题,那么如何整合基层监督力量,健全基层监督体系,促使监督监督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化,成为当前重要的课题。面临这种新形势新要求,博兴县纪委监委探索推行乡镇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建设,从统一硬件建设、组织建设、业务流程、队伍建设入手,坚持软件、硬件一起抓,推动乡镇纪委主责主业更加明确突出,职能更加完善清晰,工作更加规范有序,作用更加优化巩固,形象更加亲民为民,队伍更加坚强有力,着力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

强化保障,锻造基层监督“生力军”。加强乡镇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建设,抓好办公场所、工作阵地规范化建设是保障。博兴县把乡镇纪检监察机关硬件配备作为规范化建设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和突破口,在广泛调研基础上,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统一按照“六统一、六规范”30条标准要求,重新打造独立安全的办公区域,统一纪检监察标识,设立信访室、办公室、宣教室、档案室、谈话室、安

全室、监控室等功能室,不断推进乡镇纪委硬件规范化建设。加强乡镇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建设,配齐人员、配强力量是基础。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标准,严把“准入关”,不断优化乡镇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年龄、学历、专业结构,着力打造一支政治素质高、忠诚干净担当、专业化能力强、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

目前,全县镇(街道)纪(工)委共配备专职干事53人,兼职干事10人,实现专兼结合。同时,以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为契机,全部择优配齐镇(街道)管区(城市社区)和村(社区)党组织纪检委员,会同各村(社区)先期配备的纪检监察员联合开展工作,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县乡村三级监督网络。以“清廉村居”建设为依托,设立村(社区)纪检监察联络站,推动监督触角向基层延伸拓展。

建章立制,提升基层监督“战斗力”。制度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不断释放力量。加强乡镇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建设,健全工作机制是核心。制定出台《关于加强乡镇(街道)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镇(街道)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要求规范化建设要实现“六规范”标准,规范履职清单、规范业务流程、规范片区协作、规范议事交流、规范队伍管理、规范实绩考核。重新梳理履职清单、业务流程、工作规范等17项具体内容,细化完善问题线索处置、党员干部受处分、

婚丧喜庆、文书使用等6类台账。准确把握镇(街道)和村(社区)监督对象范围的内涵和外延,精准认定,摸清底数,建立监察对象廉政档案。健全完善考评机制,明确考核内容,细化考核指标,强化日常考核,督促镇(街道)纪委依规依纪履职尽责,推动基层监督从“有形”到“有效”、从“有效”到“长效”全面提升。

信息赋能,打好基层监督“组合拳”。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专责机关,需要不断织密监督网络,构建信息化监督体系。信息化建设不仅加强了内外部监督,也提升了依规依纪依法办事水平,推动规范化建设向纵深发展。博兴县纪委监委不断创新新形势下接访模式,在全市率先开通运行“1+3+13”远程视频接访系统,推动信访举报工作重心下移、关口前移,让群众不出远门就可以及时反映问题、表达诉求。积极运用“互联网+”手段,创新搭建信访积分预警平台,对信访问题实现预警提醒、精准督办,统计分析等功能。平台实行“红、黄、绿”三色预警,根据信访举报数量、举报方式、信访来源等情况对各镇(街道)及村居进行动态信访积分赋值,该单位区域信访地图随着信访分值变化自动变色并进行即时提醒。探索推行集村级事务办公、监督、公开、治理于一体的“清廉村居”信息化监督系统,以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推进对村级“小微权力”全过程监管。(作者为博兴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

## 以创新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变革 引领滨州高质量发展

王茜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数字信息等新基建,明确数字信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完善交通、能源等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体系,提高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对传统产业的渗透率,推动黄河流域优势制造业绿色化转型、智能化升级和数字化赋能。通过数字化技术积极响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以创新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变革引领高质量发展,科学布局数字技术促进生态保护,完善数字技术治理体系,助推滨州高质量发展。

从滨州经济发展历程来看,资源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区域的创新活动。要实现滨州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创造不竭源泉。增强技术创新能力。近年来,滨州逐渐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扶持科技创新制度和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动“双型”城市建设。加强数字人才培养,提升劳动者数字技能。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创新型人才保驾护航。完善科技人才培养、激励机制,重视培养创新型高素质人才,为创新发展持续注入动能。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支持数字经济企业与科研院所所在滨州共建人才培养基地,

扩大数字经济新知识和新技能的普及和推广教育。

产业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数字经济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滨州种植业、畜牧业规模较大,在国家粮食安全、优质农产品供应与出口生产方面具有重要保障作用。需做好资源耕地保护,发展智慧绿色农业,促进农产品安全和品质提升。数字经济为农业产业发展模式和组织形态重塑带来新的契机,要深度挖掘农业数字化转型空间,促使农业生产实现数字化监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深入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战场,要利用新兴技术推动制造向高品质“智造”转变。近年来,滨州不断加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双向融合,推进互联网为主导的新经济主体不断向经济社会延伸渗透,科学规划产业的功能和布局。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促进制造业技术效率提升,以推动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使其成为支撑滨州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

数字政府是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和重要引擎。高质量的政府治理是实现滨州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滨州高度重视并积极探索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将其作为数字化时代政府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注重“互联

网+政务服务”的政府治理创新实践。优质高效的政府服务是数字政府价值的直接体现,滨州积极构建服务高效、治理精准、决策科学的数字化政府运行模式。数字经济时代浪潮中,大数据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加系统、精准、科学的参考依据。要推动形成科学决策与社会治理机制,通过积极运用大数据,推进数据开放共享、推动资源整合、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和政府服务能力。以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为抓手,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突破。打造高效运行的数字政府,构建流程持续优化、数据无缝流动、线上线下融合的业务协同联动体系。近年来,滨州已经通过移动应用、智能设备进行线上服务,初步实现让公众办事在家、在社区即可办理业务,提高了办公效率,发挥了“数据多跑路”的作用,提高了线下服务智能化水平。注重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数字科技对数字政府建设的推动作用。比如,滨城区彭李街道通过对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的充分运用,不断推动政府管理流程、监管手段模式等全方位的创新变革,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双重限制,推动业务协同和集成服务,实现信息的高效共享和跨部门的无缝协同,进而提高政府的整体运行效率。(作者为市委党校管理教研室教师)